

故宮館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在我看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有兩大任務：一是推動國民文化教育，二是營造一個講好中國故事的平台。要做好國民文化教育，需要一個講好國家及香港故事的平台。



善治若水
胡恩威

何以講好中國故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可和全國各省市級的博物館建立一個網絡，合力組織和策劃與中國文化文明相關的展覽。這樣做一方面既有故宮的元素，也納入其他藏館的內容，進行博物館創新。例如中國書法，各省市都有精彩的藏品，是否可以港人為對象，辦一個和書法有關的教育性展覽？若可行，這個展覽還可向外輸出，尤其是東南亞地方，成為介紹漢語、書法、文字之美的一個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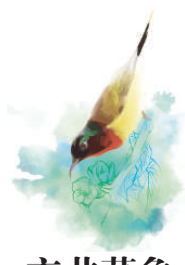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未來的定位，應該更積極打造更多以中華文化為本、面向國際的內容。這裏要提一下，香港的趙廣超先生，他曾為故宮做了很多視覺設計，在央視的紀錄片《故宮100》中擔任藝術顧問。由此可

見，不乏港人投身北京故宮博物院國際化進程。趙廣超先生還做過一份關於文房四寶、以西方為對象的教材。香港也應該邀請他來助力打造一個國民教育、文化教育的平台以及對外推廣。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還需着力的是，創造更多講好中國故事的資源，用創新、深入淺出的方法，讓世界不同文化認識中國文化，而不僅限歐美，也可以針對「一帶一路」的國家包括他們的文化。再如在中東、東南亞等地方推動中國文化，這些都是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責任所在。

要成事，香港也有人才。例如趙廣超先生，撰寫過中國傢具、故宮、書畫等著作，擁有幾十年推動中國文化的經驗。當然除了他，香港還有不少學者、設計師和專家在這方面默默耕耘。只不過，趙廣超先生與故宮的淵源比較深。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需要好好利用這些人才，在講好中國故事這方面多做長遠策略性的事情。

聚首



市井萬象



「盛世聚首——圓明園獸首特展」現正於南京城牆博物館舉行。該展覽以「圓明園海外回歸文物」為主題，展出了包括保利藝術博物館珍藏的四件圓明園西洋樓海晏堂水

利鐘構件——牛首銅像、虎首銅像、猴首銅像、豬首銅像，以及十件清宮精品文物。圖為展出的圓明園牛首銅像（左一）、虎首銅像（左二）等。

中新社

改革要講天時地利人和



維港看雲
郭一鳴

今年五月上半月的天氣，比往年來得涼快一些，周二早上出門上班，清風拂面，感覺格外涼爽舒暢，據新聞報道，早晨氣溫只有攝氏十九度左右，是本港近半個世紀來同一天最低氣溫。這一天，特區政府行政會議通過第六任行政長官人選李家超提交的新一屆政府架構改組方案，主要內容是透過新增和重組，政策局由原來十三個變成十五個，另外在三司分別增設副司長職位，改組後的特區政府架構簡稱「六司（三正三副）十五局」。高票當選短短不到十天，李家超就為實踐其政綱中提出的改革精神，交出第一份功課。

據悉，新一屆政府架構重組方案，涉及增加十三名政治委任官員和五十七個公務員職位，總薪酬開支每年九千五百萬元，架構重組方案內容還包括各正副司長的分工和各政策局權責的重新定位。很明顯，這是一次大動作，不僅涉及大筆薪津及相關配套資源的開支，更重要的是，這是在「愛國者治港」原則之下，對特區政府管治架構進行一次結構性調整，其目的當然是為了配合李家超在政綱中第一項關於提升政府管治能力的目標。為此，李家超首次在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舉行記者會，就重組方案具體內容和安排向傳媒及公眾解畫。

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多次進行架構重組和改革，例如房屋局原是回歸後第一屆特區政府三司十一局之一，之後改為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再改為運輸及房屋局，下屆政府又重新設立房屋局。政府架構方面，就由回歸時三司十一局，到現屆的三司十三局，下一屆變成六司十五局。而力度最大的體制改革，是董建華在第二個特首任內推出的高官問責制，優化特首和

整個管治班子與公務員體制的關係，建立政治委任制度。梁振英當選後曾提出增設副司長和新設文化局，但被立法會否決。李家超提出的新架構方案，部分內容與當年梁振英的建議有相似之處。從過去幾次改革的成效來看，顯然並不是政府架構愈來愈大，管治能力就愈來愈強，當中原因複雜，此處不贅。

古人指成功取決於天時地利人和，「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殃」（《孫臏兵法》）。李家超推出的政府架構重組方案，與歷任特首推行改革的最大不同，就是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兼得。天時，當然是指香港國安法的實施，香港由亂到治。地利是「一國兩制」。至於人和，包括三個方面，完善選舉制度之後，新一屆立法會九十名議員，無論地區直選，還是透過功能界別、抑或選委會選出，雖然背景不同、訴求多元，反中亂港者全部出局，「愛國者治港」翻開新一頁。因此，李家超提出的政府重組架構方案，預料不會像以前那樣，在立法會審議時遭到反對派故意阻撓，此其一。其二，據李家超透露，他已開始着手組班，收到不少推薦和自薦的人選名單。換言

之，與以往加入管治班子被稱為進入「熱廚房」的情況明顯不同。李家超接受電台訪問時承認，要拒絕當中一些人選對他是一項挑戰。香港落實「愛國者治港」，政治生態發生重大改變，很多有才能者沒有後顧之憂，願意加入政府為社會、為市民服務。第三，李家超個人有原則而比較包容、願意聽取意見的性格作風，社會人脈簡單沒有包袱，有助吸引各方人才。

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李家超銳意變革，從改組政府架構入手，志在全面提升新一屆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廣大市民樂見其成，而李家超的意願能否變成現實，關鍵不在架構如何調整，不在增加多少部門和高官人手，而是在他能否充分把握天時地利人和的難得機遇，特別是善用人和，做到吸引優秀人才加入，組建一支3A管治團隊。

今年五月的天氣，早晚清涼，中午熱而不燥，無論上班還是居家工作，都可以保持心平氣和，加上疫情趨緩，各種防疫措施放寬，各種聚會飯局多起來，大家心情愉悅，此時此刻，最宜討論改革。



▲隨著防疫措施放寬，香港市面逐漸熱鬧起來。

美聯社

零食加餐

你知道，德國小孩平時吃什麼零食麼？

糖果、巧克力，這是當然的。從美國搬來德國，我發現兩地小孩的零食習慣一樣，也不一樣。

德國小孩一樣也喜歡甜甜的零食，糖果、巧克力、冰淇淋。然

而，德國學校對小孩零食的規定非常嚴格，除了前面說的甜食一律不得帶到校園，連薯片也被拉入了「黑名單」。還有一個「常識性」的規定，就是不允許帶任何堅果到學校。因為這邊對堅果過敏的小孩不少，一旦不小心讓這些孩子接觸到堅果，過敏反應的嚴重程度可大可小。所以小孩從小知道，花生米、開心果、杏仁等等都不帶去學校。

那麼問題來了，德國學校裏的零食時間，他們吃什麼呢？

小學生一般是自帶零食，大多由父母準備的。他們的零食盒往往分為兩部分，帶兩種零食。

有的家長會裝兩種不同的水果，像生西芹、小黃瓜之類的蔬菜是不錯選擇，或者蔬果再加點芝士塊。各種芝士應是德國小孩最喜愛的零食之一，因為品種繁多，總能找到偏愛的類型。有時候芝士搭配小餅乾，他們是極其樂意吃的。

還有一種零食，便是肉腸或醃製的香腸。這邊醃製的小香腸是不需要煮的，可直接吃。有的是細細長條，像筷子一樣；有的是一個一個的小肉腸，像橡皮擦一樣。總之，小朋友吃起來相當

方便，因此也特別受歡迎。

我記得第一次拿起那像橡皮擦大小的醃製香腸，裏面感覺跟生的香腸一樣，外面的腸衣上還有一層白白的「霜」。拿在手上，對這個東西到底能不能生吃，我充滿了懷疑。最後我還是忍不住好奇嘗了嘗，意外的好吃。它既有熏肉的香味，又自帶着一股清甜。後來給孩子準備零食，我也時不時「偷吃」一口。

對於中學生來說，零食時間存在的意義和小學生稍微有點不同。小學生主要是為了加餐和休息，中學生卻有更重要的「社交」意義。這是他們在學校裏並不多的可閒聊的時間。比起小學生吃的像是特意為兒童包裝的零食，中學生們吃的更「正規」一些。所以與其說叫零食時間，不如說是「早午餐」。

一些中學會給腦力勞動強度太大的中學生免費提供「早午餐」，東西不會特別多，但填飽肚子是沒有問題的。這樣的早午餐會有幾種不同的麵包，當然以全麥麵包和黑麵包為主，然後有幾種果醬、黃油和芝士，還有兩種水果，橙子、葡萄或蘋果，以及一些水和果汁。

從德國小孩的零食單上，可見德國人對小孩飲食健康還是相當考究，允許的和不允许的，都有鮮明的界限。這不難理解，德國人嘛，都很認真的。照顧小孩子，更不會例外。

懷念一起出書的日子



HK人與事
東瑞

疫情兩年多，影響各行各業，出版業也不例外。發行商以前一兩個月來取貨、添貨一次，現在大半年不到一次。情況如此不濟，文章雖因為宅家得閒拚命地寫，結集成書則一拖再拖，遲遲不敢出。香港曾經是出版的黃金地，幾百家大小出版社共存，新書在書店如走馬燈，上架幾天，一旦銷情不好、沒人問津，很快就消失無蹤。書店各類書的命運，依照的是「弱肉強食」，以金融、風水、股經、旅遊類別最為強勁，長期擺在最搶眼之處。一般作者的純文學書只是風光一下，有的甚至原封不動地退回出版社。

行外人看出書作者風光有臉，行內作者則知內情、苦澀自知。我的兩本書：小小說集《愛在瘟疫蔓延時》和長篇《快樂的金子》「生不逢時」，也因疫情，姍姍來遲。疫情嚴峻時，書店如其他店鋪一樣「行人寥寂車馬稀」，連其他出版步驟，如運輸也大受影響（開工不足），過去出版業鼎盛時期印行一千、兩千冊的好景已經不再，如今一般的書，只印幾百本，也大多數用來送贈文

友。

寫作人，都喜歡將書視為自己的另類子女。確實，與人類的幼嬰在母體裏成長的過程有點相似：孕婦「十月懷胎，一朝分娩」，寫作人也經歷了一番醞釀和不短的時間，書稿才最後定稿出版。因此一本書印出來、面世的日子，也就相當於嬰兒的誕生，都是一種「生日」。為了廣為人知，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盛行新書的「發布會」或「發表會」，熱鬧一番。

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港澳文學作品引進內地出版，銷情都不錯，不但印量大，而且擁有相當多讀者。當時我好幾本書在廣州等地出版，如《夜香港》《白領麗人》，出版社交由梧州一家書屋發行，書屋老闆就邀請我出席現場簽售活動。當時出版社總編輯陪我到梧州，五百多本書一售而空。也記得，二〇〇〇年，印尼華文「解凍」不久，在雅加達，舉辦過六本書一起發布的活動，還請作者出席簽售會。印尼華文被禁三十多年後，那麼多書一道出版與讀者見面還是首次，我也有一本印華文學評論集

《流金季節》參與簽售，親眼目睹了當時的盛況。在香港，也曾經與另一位文友在校友會會所舉行發布會，獲得校友、文友的支持。二〇一九年十二月，我的散文集《金門老家回不厭》，在金門出版，參加了金門縣文化局舉辦的集體發布會，有二十三本書及部分作者出席了，我和妻子也從香港趕去參加，場地雖小布置得卻美觀大方，儀式簡單而隆重。各地的發布會，如今似乎只成了溫馨親切的回憶。

疫情爆發，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也令百業俱衰，書業也慘不忍睹。兩年多來，結合和取材疫情，寫一些正能量的勵志小故事，不知不覺也寫了約八十篇，淘汰一些，選了六十三篇，結集成《愛在瘟疫蔓延時》，拖遲了一年出版。雖然大部分送人，但也收到感人的溫暖心意，如暖風沐浴身心。如，文友在報紙上介紹或發表讀後感，還有位校友獲贈我小書後塞來面額不小的紅包，寫了勉勵讚美的話，讀得我眼熱：「你們對文學的熱愛、對創作的熱誠，在嚴格防疫的封閉環境下，竟能心平氣和地寫下幾十

萬字抗疫文章，令人敬佩！我的小小心意，只表示對你們的敬意，再版不要再提我。」一位文友偶然走進書店，看到我的小書被展示，特地拍攝下來，轉發給我看，心中多少也有點安慰驚喜。

在疫情連年蔓延的日子，寫了不少東西，算來也不止兩本書的分量，暫時也只能擇優、切合時宜的先出版了，也聊勝於無，算是對社會和漫長的時間有所交代了。



▲東瑞著《愛在瘟疫蔓延時》《快樂的金子》。

作者供圖